

· 学术评论 ·

谈谈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多学科交叉问题

董 国 强

中国当代史研究是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新兴门类，其创建和发展的历程可以追溯到 1981 年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最初出现的时候一般被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后来列入“中国通史”教学序列才普遍被称为“中国当代史”。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在该门类的教学和研究方面走在全国高校兄弟院系的前列。早在 1983 年就开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程，由郭勋教授主讲。1985 年，笔者从该系本科毕业后留校，为郭勋教授担任助教。两年后，郭勋教授退休，笔者开始担任该课程和其他相关课程的教学任务，同时进行相关学术研究。2015 年，笔者调至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后，教学和研究任务一仍其旧。因而毫不夸张地说，笔者个人的学术成长经历与当代史研究的学科发展完全同步。近 40 年的持续学习和研究实践，使笔者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教训，形成了一些系统性的个人看法，愿意在此与各位学界同道交流切磋，集思广益。

既然当代史研究是广义史学研究的一部分，当然具有史学研究的一般特点。不过作为专攻该领域的研究者，笔者主要结合个人的经验和体验，谈谈当代史研究的独特之处。依个人浅见，这些独特之处主要源于“新史学”——相对于“传统史学”而言——观念的影响，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的渗透。概要说来，传统史学主要关注精英人物的活动，关注国家层面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新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则主要关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形塑人们日常生活的制度环境。这种研究视角的转换，必然带来研究方法的创新突破。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代史研究完全拒斥传统史学研究的观念与实践。事实上，在过去近 40 年时间里，当代史研究领域出现的许多具有重大影响的经典论著，如 1989 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1949—1989 年的中国”系列丛书，杨奎松的建国史研究论著，沈志华的当代中国外交研究论著，张素华关于 1962 年七千人大会的研究论著，郭德宏等人关于 20 世纪 60 年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研究论著，王年一、卜伟华等人关于 1966 年至 1976 年中国政治运动的研究论著，韩钢等人关于改革开放史的研究论著等，都可以归入传统史学研究的范畴。这里只是想指出，在当代史研究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得新的研究理念及其实践显得越来越重要。

上文提到的一些重要论著的作者大多是学界前辈，其中很多人曾供职于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校、国防大学等机构，有机会接触大量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献，具有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尽管限于工作纪律，他们不能公开引用这些内部资料，但大量系统地阅读相关资料，使他们对一些常见史料的深入解读能力令一般研究者望尘莫及。因而，他们可以沿用传统史学的研究路径，写出一些富含洞见、广受欢迎的经典论著——尤其是在研究高层精英政治方面。

但对许多就职于地方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中青年学者尤其是越来越多的硕博士研究生而言，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们在进入当代史研究领域时遭遇的首要难题，是难以获得传统史学研究不可或缺

的档案资料和其他重要历史文献。在 198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颁布之前，一般研究者无法根据研究需要，进入各级政府的档案管理机构查阅档案资料。学术界能够看到的主要是由党政有关部门或研究机构编辑出版的各种“文件汇编”“资料汇编”等。由于这些资料汇编往往旨在服务于政府部门的某些专项工作，所以对于一些尝试研究不同问题的研究者来说，帮助十分有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公布施行以后，上述状况一度有所改变。但总体而言，政府档案资料和其他内部文件的开放程度依然十分有限。就笔者所知，一度开放程度较高的档案资料是教育系统、卫生系统和一些经济部门的档案。各级党政机关、公检法系统、军队系统和外交部门的工作档案大多没有开放或有限开放。因而，近 20 年来，许多涉及当代史研究的硕博士论文选题大多聚焦于地方性的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和社会经济发展。同时，近年来，各地档案馆里一些业已开放的档案资料在检索和调阅时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这种客观现实促使很多陆续进入当代史研究领域的中青年学者放弃传统史学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转而寻求其他路径和方法。笔者关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地方性群众运动的研究，就是从大规模的访谈口述开始的，然后才因各种机缘巧合，接触到大量档案资料和其他历史文献。

二

就主观方面而言，许多中青年学者的大学教育和学术成长环境与前辈学者存在较大差异，这也是导致当代史研究在观念和实践方面多元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以笔者为例，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外学术交流不断加强的大环境下度过的，在思想观念上较少条条框框，乐于接受各种新鲜事物。在后来的长期研究实践过程中，又逐步接受了“新史学”观念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对笔者影响最大的“新史学”论著是 1989 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姚蒙编译的《新史学》，该书是法国年鉴学派几位重要领军人物的重要论文选编。后来又读到践行“新史学”理念的经典著作——乔治·鲁德的《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这些论著带来的史学研究观念变化，是将研究重点由精英人物转向普通民众；摒弃宏大叙事的论述范式，转而采用地方史和社会史视角，进行专题性的微观实证研究。这里需要特别申明，法国年鉴学派倡导的“新史学”并不是彻底否定社会精英的作用，而是要在一个更广泛的视野下重新审视他们的地位和作用。“新史学”所倡导的“社会史”，也不是在现有史学研究门类如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外交史、文化史等之外再增加一个新的分支，而是主张从某些社会现象和社会事件出发，采用自下而上的视角，对特定时段的历史进行贯通性、整体性的考察，揭示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在形塑历史过程中的广泛参与。所以指责“新史学”倡导的“社会史”会导致史学研究的“碎片化”，是不值一驳的谬见。

与此同时，尽管国内的当代史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但是在国际学界，关于当代中国的研究伴随着新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不断推进，早已有大量影响广泛的经典论著问世。这些经典论著的作者大多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的研究和著述，大多被归类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但对初涉当代史研究领域的国内中青年学者而言，这些经典论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笔者为例，除了国内各大出版社陆续推出的一些汉译名著外，还阅读过不少尚未汉译的英文原著，使笔者在无形中接受了社会科学研究理念和方法的启蒙。

举例来说，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麦克法夸尔关于 1956 年至 1966 年中国政治发展的三部曲论著，主要依据毛泽东的讲话和文章、中共领袖人物传记和国内主流报刊等资料展开论述。他在分析党内高层意见分歧时，注意到中央领导班子成员的个人性格差异如何影响到他们对形势和任务的判断，以及不同部门负责人基于本部门工作考量所产生的不同政策偏好。这种基于政治学理论的考察论述，使得传统史学所隐含的狭隘的“人性论”和“阴谋论”解释相形见绌。

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魏昂德的成名作《共产党中国社会的新传统主义》，采用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式，专题讨论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工业企业内部的干群关系。他

指出，“单位”制度造成了工人对单位和干部的依附性，使得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构想无法落实；干部也无权解雇不努力工作的工人，使得企业内部的一些规章制度形同虚设。久而久之，工人和干部的生产积极性都受到严重制约。这样的研究不但揭示了单位内部干群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而且揭示了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和更为广泛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美国学者弗里曼、毕克伟和塞尔登合著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综合运用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专题讨论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耿长锁合作社的起源和发展。由书中的翔实论述不难看出，20世纪40年代耿长锁合作社的成功经营和发展壮大依赖于几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尤其是自愿互利原则、经济效益优先原则和依托市场机制原则，实际上从反面揭示了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存在的某些历史局限性。

曾任康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的华人学者王绍光的成名作《理性与疯狂》，专题讨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武汉地区群众运动的形成与发展，信息来源包括党内文件、中央和地方报刊、群众组织出版物、访谈口述资料和回忆录等。他在探讨群众派性斗争问题时，一反传统史学论著中常见的“人性论”观点以及很多亲历者经常挂在嘴边的“迷信”“盲从”说法，强调每个人的言论和行动实际上都包含着某种程度的理性判断。他还综合运用政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成熟理论，深入剖析了“崇拜者”与“偶像”之间的微妙关系，指出每个崇拜者心目中的偶像并非一个高度泛化和客体化的抽象符号，而是其自身利益诉求与是非观念的折射反映。这种分析就意味着，任何细微的社会地位、现实处境和思想观念差异，都有可能影响到不同个体对于偶像形象的主观形塑。这就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干部群众都真心崇拜毛泽东，却又一直深陷派性斗争的漩涡而难以自拔。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裴宜理和中国学者李逊合著的《无产阶级的力量》一书，利用工会系统档案资料、公检法部门审讯笔录和访谈口述资料，专题讨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地区的工人运动，特别注意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实行的两种用工制度以及基于籍贯和代际差别的人际关系网络，是造成工人群体内部分化与冲突的重要根源。

以上论著不仅在研究选题和理论阐释等方面极具启发性，而且在信息来源上也有很大拓展——既采用了档案资料、报刊资料和其他历史文献，还采用了许多民间史料和访谈口述资料。以下论著在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方面的突破创新，更加令人意想不到——即使没有档案资料和其他历史文献，也可以进行相关研究。

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贺萧与中国学者合作，尝试探讨不同性别的记忆差异。由于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从未进入各级党政领导机构的议事日程，所以这项研究所需要的信息不仅在一般党政机关的工作档案中难见踪迹，即使妇联系统的工作档案也不例外。因而他们不得不花费近十年的时间，利用田野调查和访谈口述的方式开展研究。最终的研究成果表明，与很多人的主观预设不同，不识字的老年农村妇女其实也有自己的历史记忆，只是她们的记忆参照坐标不是脱胎于主流历史叙事，而是奠基于她们自己的家庭生活——尤其是她们的婚姻和生育。

曾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社会学教授的华人学者陈佩华的成名作《毛主席的孩子们》，专题讨论红卫兵一代精神素质的形成和发展。她的研究信息完全来自对十几位移居香港的前广州红卫兵的深度访谈。而她分析解读这些访谈资料的主要工具，正是一些当时常见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概念。该书指出，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政治化对红卫兵一代的“权威人格”（即一方面服从权威，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成为权威，要求别人服从自己）的形成至关重要。该书还指出，红卫兵群体内部的派性形成既与个人的家庭出身有关，也与个人的政治表现能否得到认可有关。这些看法再一次彰显了社会环境和制度因素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日常言行的决定性影响。

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魏昂德一项长达20多年的研究，采用社会学的定量研究方法，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陆续公开出版的2400多部新方志为主要信息来源，通过采集、整理、汇总各种数据，建立了许多数据分析模型，揭示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范围群众运动形成与发展的整体

态势和阶段性特点。书中关于各级党政系统在发动群众运动时的重要作用、大量党员干部如何卷入群众运动、“三支两军”决策的主观预期与实际后果等问题的论述，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这项研究不仅突破了现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地域性限制，而且提出了许多传统史学无法提出的十分重要的新议题，促使研究者反思现有的认知和解释体系，继续深化相关研究。

有必要指出的是，以上关于国外“新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论著的推介，并不意味着笔者完全认同书中的所有论断，而是强调其在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方面的启迪作用。这些经典论著所展现的理论视野，它们提出问题以及采集和处理研究信息的方式，必然对国内初涉当代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

从近 20 多年来的发展情况看，很多国内学者——包括越来越多的硕博士研究生——已经对当代史研究的社会史视角和多学科交叉特点有所意识，在研究实作中有所践行，并出现了一些优秀论著。但总体而言，优秀作品在近些年来大量涌现的相关论著中的比重不大。绝大多数相关论著尤其是许多中青年学者和硕博士研究生的作品，还明显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也就是说，尽管很多研究者在主观上是积极追求创新突破的，然而其研究实作还无法令人满意。

这里有必要指出，强调当代史研究的多学科交叉特点，旨在提升理论视野，拓展研究路径，丰富研究方法。但研究者不应该忘记一个重要原则——归根结底，研究方法必须服从与服务于研究实作。有些中青年学者和硕博士研究生的论文，用大量篇幅阐释一些相关经典论著中的经典论断和经典概念，但在如何将那些经典论断和经典概念有机地融入自己的专题研究方面，则显得十分简单生硬，甚至草草了之。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两张皮”现象。在笔者看来，经典理论和经典概念的启发作用，在于引领研究者如何从不同视角去发现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选题，以及可能通过哪些新的途径去搜集相关研究所必需的各种资讯，从而揭示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面相。历史研究者的日常工作，还是搜集、整理、分析、甄别涉及具体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各种信息；史学论著的主要内容，还是基于多种信息来源的历史叙事。如果把专题研究论文当作展示作者理论素养的橱窗，无的放矢地就某些新理论、新概念和新方法夸夸其谈，使具体的史实陈述沦为陪衬，显然是一种本末倒置。当然，专题讨论史学史和史学研究方法论的论文除外。

对社会科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广泛借鉴，看似极大丰富了研究工具箱。但在研究实作层面，当一个研究选题明确后，研究者能用得上的工具往往也就那么几种。也就是说，采用何种或几种研究路径和方法，是由特定研究选题决定的。在评价一项研究成果时，并不是看研究方法应用数量的多寡，而是看研究方法是否与研究选题相互匹配以及研究方法使用的精熟程度。

就笔者研究经历而言，除了传统史学研究很看重的文献研究方法之外，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是大量地、系统性地采集、整理和使用历史亲历者的口述历史资料。南京个案研究中的访谈对象多达 100 多人，徐州个案研究中的访谈对象约为 30 人，丰县个案研究中的访谈对象约为 40 人。将口述历史资料的重要性与历史文献的重要性等量齐观，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理由。其一，1949 年以后档案资料固然是各级党政机构和各类企事业单位日常工作的记录，包含了丰富的系统性历史信息，但这些信息的记录者主要是各级党政干部。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下，在全国一盘棋的统筹安排下，各级党政机关和各企事业单位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工作重点和工作步骤都是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进行的。所以，政府档案资料主要反映党政干部群体的关注、认知和行动，即使涉及一些基层实况和社会舆情，也主要来自党员干部的汇报总结。因而，来自其他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口述历史资料，可以提供与档案资料不同的观察视角和历史叙事。其二，在当代中国的行政实践中，上级领导机关对基层工作的指导干预实际上存在着“常态化”和“非常态化”两种类型。“常态化”指导干预往往通过会议和文件方式实现，因而能够在档案资料中得到反映。“非常态化”指导干预则带有小范

围、非正式等特点，很少形成正式的文字记录。因此，一些亲历者的口述历史资料可以弥补后者的缺憾，帮助研究者深入了解一些看似突兀的重要变故的来龙去脉。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如果要将访谈口述作为历史研究的主要手段，就必须注意访谈口述资料的样本容量和访谈对象的典型性问题。通俗地说，就是要与大量不同类型（如家庭出身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政治态度不同、个人遭遇不同等）的亲历者进行广泛接触。只有实施大规模、系统性、差异化的访谈口述，才能有助于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观察某一历史事件，了解不同个人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观念预设的差异。零星的、随机的、同质化的访谈口述，很难在历史研究中发挥实质性作用。

由此可见，口述历史是研究者与亲历者合作的产物，研究者在这种合作实践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他们的问题意识决定了口述历史资料的具体内容，他们对相关历史背景和访谈对象的了解程度决定着口述历史资料的质量。如果研究者仅仅将自己视为被动的记录者，对访谈对象的口述内容缺乏必要而有针对性的质询和求证，那么就无法了解访谈对象的观念预设的潜在影响，无法评估口述历史内容的客观性和可信度。事实上，访谈对象往往会在访谈中对访谈者施加影响，试图使访谈口述资料成为对他们自己有利的历史证言。研究者必须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另外，口述历史采集的过程也是搜集各种历史文献尤其是民间历史文献的过程。在笔者的研究实践中，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包括一些系统完整的个人工作笔记、系统完整的群众组织出版物、较为系统完整的地方档案资料以及因各种原因散失在民间的党内文件等，就是从访谈对象那里获得的。

四

上述各节旨在说明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对当代史研究的重要影响，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史学研究——包括传统史学研究——一无是处。事实上，笔者经常听到一些不同学科的研究者谈及史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对他们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显而易见，史学研究者们在学术实践中广泛借鉴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必然会带来研究视角、研究题材、研究方法和著述风格的显著变化。但对于大多数史学研究者而言，他们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所接受的史学专业训练，决定了不大可能摇身一变成为纯粹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况且就学术研究本身而言，也没有这个必要。自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史学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门类长期存在，本身就说明了它的独特价值所在。在笔者看来，史学研究的特点和长处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首先，史学研究者的看家本领是档案和文献研究。“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反思，并不是要完全否定档案资料的重要作用，而是反对将档案资料作为研究资讯的唯一来源。“新史学”观念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任何类型的史料（包括档案资料、报刊资料、文件汇编、历史影像资料、实物史料、群众组织出版物、个人日记和书信、个人工作笔记、坦白交代材料、检举揭发材料、申诉平反材料、口述历史资料、回忆录资料等等）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都带有某些特定的时代烙印和人们的主观片面性。与此同时，各种不同来源的史料信息，往往能够凸显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认知、诉求和行动。就这一点而言，不同类型和不同来源的史料在史学研究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各自具有不可替代性。例如笔者在近几年关于苏北丰县的研究中发现，在1966年下半年至1967年初的县委和县人委工作档案中，很少有关于当地业已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和群众组织活动的记载。当时县委和县人委领导层的工作重点，是如何巩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果，诸如调整县委和县人委领导班子、加强“贫协”和民兵的组织工作、如何搞好全县工农业生产等。对于当时在大中城市已经轰轰烈烈展开的政治运动，他们似乎感到难以理解，很少采取实际行动。与此同时，通过访谈当地一些群众运动积极分子，研究他们提供的群众组织出版物和各种传单，便可以了解这一时段群众运动在城乡基层单位萌芽和发展的情况。然而这些访谈口述资料和群众组织出版物，又对县级党政机关内部的情况知之甚少、语焉不详。由此可见，如果史学研究者要想全面客观地再现这一时期当地的群众运动实况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冲突，就必

须同时依赖上述两类不同信息来源。

其次，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常常将访谈口述资料作为重要的信息来源。然而访谈口述资料与回忆录资料类似，都是在历史事件和个人活动发生数十年以后形成的。本文在此不拟讨论这类资料必然存在的个人主观偏见问题，而是想重点指出至少有两个因素会影响到历史记忆的准确性：一是时间相隔久远带来的记忆模糊和记忆误差；二是访谈对象后来的人生经历和认知变化对其原始历史记忆的“污染”。相对而言，档案资料和其他历史文献都是当年形成的，始终保持着原始生态。因此，它们可以作为历史记忆的定位仪和校准器，用以验证访谈口述资料的客观性和可信度，并修正访谈口述资料中的记忆误差和认知盲区。

再次，在论述方式上，史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自身的鲜明特点。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谈到，历史学是由林林总总的个别历史事件所构成，每一起历史事件都有独特的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结果等要素，因此必须一个个来进行分别解释。而社会学虽然也以各种社会事件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倾向于将社会事件中的众多个体经验进行总结归纳，从而形成各种类型观念。用韦伯的原话，社会学“是建立类型概念，并追求经验事实的普遍规律的一门科学”^①。

笔者曾广泛涉猎国内外社会科学方面的论著，而且近十多年来一直与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魏昂德进行合作研究，所以对韦伯的上述论断深有体会。就笔者所知，社会科学研究都是从社会现象出发，综合运用某些特定的理论框架和概念范畴，对个体和群体的思想和言行进行分类研究。由此产生的论述，尽管有时也会涉及一些个人情况，但一般不会给人留下关于个人的深刻印象。例如魏昂德教授前些年出版的专著《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其考察论述内容在时段上涵盖1949年以后的30多年，在地域上覆盖全国各地城乡，但书中提到的历史人物数量极为有限。而他在2019年出版的另一本专著，旨在考察1966年至1969年间全国范围群众运动的发展过程，书中提到的历史人物更是屈指可数。由于社会科学研究强调较为抽象的类型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个体的存在，所以社会科学论著往往很难呈现叙述连贯、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这显然不利于历史知识在社会大众中的传播普及。

正因为对不同学科的特点和长处有较为充分的认知，笔者在相关研究和著述中，一方面注意借鉴吸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些理论概念和结构分析框架，注重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多方互动；另一方面也注意充分发挥史学研究著述的长处，注重历时性的发展线索和一些重要人物的活动轨迹，尽可能保持历史叙事的完整性和戏剧性。

总而言之，学术研究工作很少是在极其理想的条件下进行的，研究者总是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挑战。所谓学术研究的突破创新，实际上就是研究者不断想办法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将有价值和有意义的研究工作进行到底。纵观古今中外学术研究发展的历史，许多新兴学科和门类的出现，就是因为传统的认知体系和研究方法无法解决研究者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促使他们在研究中另辟蹊径。一些新兴学科和门类的创立者往往出于捍卫其新领地的动机，过分强调这些学科和门类的独特之处。作为一般研究者，其实不必在意这样的学科藩篱。历史研究工作总是从某个具体选题出发的，无论哪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只要有助于解决问题，都应该积极借鉴和运用。学术研究的突破创新，往往发生在不同学科交叉的边缘地带。但不同学者所接受的基本训练以及他们过往的研究经历，也会在其论著中留下深刻的个人烙印。

(本文作者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 吴志军)

^① 转引自严飞《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第226页。